

我本来就不漂亮

——记一位同学

作者：章诒和

我在读戏曲文学系的第一年，忽然来了一个插班生，叫梁清濂，女性，岁数不小了，不像学生，像个干部。一打听，还真是个干部，来自北京京剧团（后改称北京京剧院）。我和几个同学揣测：此人应该是个编剧吧，组织上派她学习，多半是为了提高专业写作水平，好给剧团创作出可供演出的剧本。再打听，人家不是编剧，是政工干部——剧院共青团支部书记。看来此人不简单呀，一个搞政工的，能脱产三年学文化。

班长把她的书桌摆放在我的旁边，我暗自叫苦，心想：这下可好，天天有人给我上政治课啦。书桌并排而放，于是就有机会仔细打量。她长得一般：皮肤粗糙，脸色发暗，下巴略微突出，眼睛却是极有神，又黑又亮。她穿着讲究，永远的西装女裤，西式外套，尖领衬衫，半高跟皮鞋。我想跟她说：应该穿圆领衬衫，好让线条柔和一些，但始终没好意思说出口。她是全班唯一烫发的女性，蓬蓬松松，还经常抹头油，如有阳光穿过玻璃窗，她的卷发就会闪着光。总之，梁清濂的打扮很有点“资产阶级情调”，但没人敢讲。因为人家既是中共党员，还是在职共青团骨干。

那时，北京京剧院的演员阵容空前强大，有五大头牌，分别是谭富英、马连良、裘盛戎、张君秋、赵燕侠。而且这个排位顺序是固定了的。他们轮番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，剧院给这些“大角儿”规定了演出场次，如马连良每月演出十七场，裘盛戎每月二十场上下……要知道，一个艺人能登台演戏既是他们的追求，也是养家糊口的饭碗。梅兰芳从1949—1959的十年间，大概只演了一出新戏《穆桂英挂帅》，也就是说，空耗了十年光阴，比八年抗战蓄须明志还长。应该说，在彭真掌管下的北京京剧院当演员，算是一种幸运。

我曾问梁清濂：“五大头牌里，谁的上座率好？”

“五个都好，海报一贴，立马全满。”

“那他们当中，谁又最好呢？”

“票卖得最快的是赵燕侠。”

“她？”

“当然啦！男人喜欢他，当兵的喜欢她，不懂戏的也喜欢她。”

“为什么不懂戏的人喜欢赵燕

侠？”我有点不解。

梁清濂说：“赵燕侠长得漂亮，身段好，会做戏，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吐字清晰，有些字还特别吸收了普通话的发音。那些听不大懂戏词的人，能听得懂她的唱。”

“哦！”我后来仔细听赵燕侠，果真如此。

出于好奇，我还问到这些名角的工资收入。她告诉我：1949年后，除了梅（兰芳）、程（砚秋），在戏曲演员里张、马、裘、谭、赵的工资是最高的。马连良月薪一千七，赵燕侠月薪也是小一千。这在普遍工资（月薪）仅为三、四十元的那个年月，显得不可思议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给他们那么高的工资？我父亲当部长，每月三百五，挺高的。但跟他们比，就差远了。”

她撇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人家解放前挣的是什么？你爸夜夜挣大洋吗？你不懂，人家彭真懂。”

1959年，北京京剧院演出《赵氏孤儿》，五大头牌联袂演出，轰动京城！马连良扮演的程婴最为成功，十四场戏，程婴占了八场，每一场里的马连良都是引人入胜，特别是“绘图说破”一场，唱、念、做、表，都是超水平发挥。还有裘盛戎扮演的魏绛，张君秋扮演的庄姬公主，马富禄扮演的晋灵公，谭元寿扮演的赵武，也是个耀眼。首演那天，我们全家都去了！父亲特别激动，反右运动中因与马连良私人交往频繁，1956年又拉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，这给马连良带来麻烦，几乎成为右派。父亲一直心怀愧疚。后来，梁清濂告诉我，多亏彭真高抬贵手且敢作敢当，让马连良过了关。看来，毛泽东在“文革”前夕指责彭真在北京市搞“独立王国”，还真不是捕风捉影。

自打和梁清濂接触，我知道了有关名艺人的个人生活情况，尤其对某些不能公开的事儿，我最爱听。其中极具吸引力的，就是关于吸毒。

梁清濂告诉我：“艺人都抽！”听了，心里一“哆嗦”。



谭富英、张君秋、马连良、王廷岭《赵氏孤儿》剧照，1960年

接着，又补充道：“旦角儿一般不抽，因为沾上这一口儿，色相就没了。色相一没，那就没有饭了。”

我说：“吸毒不是犯法吗？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当初他们都经过强制戒毒。比如裘盛戎，毒瘾大了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？”

“什么叫从娘胎里带来？”

“就是父母抽，全家抽。”

“哦。”我说：“咱政府不是成立了戒毒所吗？”

梁清濂说：“戒毒？对有人管用，对有人不管用。”

“有谁不管用？”

“对裘盛戎就不管用。当初剧团领导是把裘老板送到公安医院，还派了几个人在医院轮流看守。谁想到，他第二天就大闹病房，还天天闹。这样下去，人就跨了，今后还怎么唱戏？”

“后来呢？”我大感兴趣地追问。

“剧团领导担不起这个后果，向文化局汇报。文化局也担不起，汇报到彭真

那里。彭真既是北京市委书记，又是中央政法书记。他说：‘他戒毒？他还戒什么毒！’就这么一句话，让他出院回家。”

我又问：“再后来呢？”

“再后来，由彭真特批，每天定时定量供应。”

云南京剧院的名演员关鹤鹑也抽。到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，也是由彭真特批，每天打海洛因。

据我所知，这种“特批”维持到文革爆发，彭真倒台。

1963年，北京京剧院赴香港演出，上头对这次赴港极为重视。演出大获成功，许多台湾人都漂洋过海到香港看演出。剧团归来，我特地去听领队、团长和名演员的汇报座谈会。梁清濂知道后大笑，说我热情过度。随后她问：“他们汇报的时候，说过自己带回多少行李吗？”

“没说。”

（下接第B2版 →）